

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与见证(下) ◆ 罗屿

梁老师为他讲日本渔民的勇敢,讲日本劳动人民的勤劳,这些话,让从小生活在中国人中的中岛,心中沉积的关于身为日本人的罪恶感慢慢化解。梁老师还给他讲,当时发生在长崎岛的烧毁中国国旗事件,说:“梁老师!我想回日本去!”

在第二次关于“去”与“留”的抉择中,中岛做出了与此前不同的选择。

1958年,中岛16岁,在梁老师的帮助及多方协调下,他返回日本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首先,中岛要去趟哈尔滨联系回国之事,但没有路费。他一五一十和赵父说了想法,后者非但没有阻拦,还给了中岛50元钱,这比梁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中岛离开时,赵父正在切菜,他甚至没有转头看中岛一眼,只是说:“世界上大着呢。这次出去好好见识见识。”中岛没有想到,这次分开,成了他和赵父的永别。

办理回国手续时,中岛中途回沙兰探望养母。看到儿子满心欢喜的养母,忽然发现了中岛藏着的海关通知书。养母一手拿着通知书,一手拍打着,对中岛说:“你想回日本,明摆着说出来,妈把牛卖了,也要给你张罗盘缠。你翅膀也越来越硬了。想往哪飞就往哪飞吧!妈不会强留你……你虽然不是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十几年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不就成了我身上的一块

肉吗?”养母一口气说完,擦了下眼泪。在中岛眼里,养母一直是个刚强的女人。之前,再苦再难,从没见过她掉过泪。

如今古稀之年的中岛说,当初决定回国,确实和养母不在身边有关。他记得那一天眼泪不断的养母对他说:“把你留在林业局,是为了你将来能有出息。娇生惯养能好吗?妈的心情你明白吗?”

“过了好多年,自己的岁数也大了,才明白养母为了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而我当初根本不理解养母的一片心,甚至还怨过她老人家。”中岛说,离开养母家时,她对他说:“有空再回来。”而他也以为,还有机会和养父母正式告别,就把想要说的都咽了下去。

中岛回国手续,办得既快,且顺利。他不知该悲该喜,他只是被命运推着向前。当他带着公安局介绍信办理最后一道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他,日方派遣接日侨的船,已经到达塘沽,准备回国的其他侨民都已在天津的酒店等待开船。最重要的是,接送日侨的工作即将结束,这很可能是最后一艘回日本的船,要想赶上,就得立即坐火车赶往天津。

无法和养父母正式告别,无法获得养母的正式同意,1958年7月9日,作为那批日侨中年龄最小的独自归国者,中岛踏上了带着他全家来到中国的那艘名为“白山丸”号的船,返回日本。

“我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

“白山丸”号抵达日本那天,生母和家人在岸上等待。中岛看到两



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个打着“欢迎中岛幼八”的旗帜,另一个则盯着他哭,并拉住他胳膊,他判断:或许,这就是生母吧。

回到日本后的中岛,需要重新认知的,不仅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语言、饮食、生活习惯,所有一切,都需从头开始。他想念中国的家,打听去中国的船只,提出回中国的渴望。但那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怎么可能任他来去。

既然回中国无望,梁老师那句“要为中日友好做些事情”在他心里被唤醒。他开始拼命学习,高中毕业后进入日中友好协会工作,后来转行成为一名翻译,直到退休。梁老师的嘱托,成了中岛毕生追求。

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中岛的主要工作是为访华团担任翻译,他陪同过廖承志、邓颖超、唐家璇等等。邓颖超还夸奖他:“你的汉语讲得这么好!”他解释说:“过奖了,我

是在中国长大的。”

在中日友好工作后,中岛终于有机会随团访华。只是,那时的他并不允许随意回沙兰探望养母。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访华时,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多年,依然在中岛耳畔。

或许“有负”养母,成了中岛此生最大的遗憾。回国后的他,不仅与梁老师保持通信,也和儿时好友段元昌等人,保持多年的信件往来。1976年初,在段元昌的信中,他获知了养母去世的消息。上年年底,他托人寄给养父母用来置办年货的100元钱,用作了养母的丧事。听闻噩耗,中岛迫切想回乡给养母祭扫,看望李父。

那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虽然递交了申请,中岛仍担心,不一定能被放行。但鉴于中岛对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最终,李父被黑龙江相关政府部门接到宁安县国际饭店与中岛见面。当时,李父患有严重肺气肿,是被担架抬着进的酒店房间,中岛上前拥抱他,激动得说不出话。相聚的时间只有一天,中岛尽力尽孝,吃饭时给老人挑鱼刺,睡觉时帮老人接小便。李父则不停地和旁人讲:“这孩子小时候就特别仁义。”

1978年,李父去世。1987年,中岛回乡将李父骨灰安葬在养母棺木旁,后又拜祭了陈父和1969年去世的赵父。2007年,中岛再次回乡拜祭,为赵父迁坟。1987年那次回乡,中岛从邻居口中听说,当年自己不辞而别,养母听说后,一下子瘫在地上,双手抓着土,死去活来地叫着:“我的儿

啊,你怎么把妈扔下,就回去了?!”

年老后的中岛常自问,这辈子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而这也是促使他写作回忆录《何有此生》的原因。

完成日文版写作后,由于是新入,且战争遗孤在日本是边缘群体,属冷门题材,中岛只好拿了一年养老金自费出版。没有销售渠道,他找到家附近一家书店。店主最初只让他留一本,第二天却打来电话,说一夜没睡把书看完,被深深感动。此后,店主在店内挂起海报,并走上街头派发印着“感动,感动”的传单,主动帮中岛宣传。中岛的书打动了日本读者,媒体上也开始逐渐出现报道,几次加印,目前,日文版已销售3000册。“其实,日本老百姓也很善良,善良的人也要有主见。”

在日本版基础上,中岛又完成了中文版写作。

中岛的一生,存在着遗孤、儿子、中日关系建设者的三重身份,每一种身份背后都充满故事。当他一次次追问“何有此生”时,他发现最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它伤害的,不只是作为受害者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等国人民,也使日本自己的国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中岛至今不知父亲死于何时,埋骨何方。

距离1945年8月15日已过去七十年。中岛说,他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增进理解,不使灾难的噩梦重演,“这本回忆录如能起到一些好作用,则是我十分欣慰的。”

(本文参考中岛幼八《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摘自《小康》2015年11月上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五章 聪慧(连载 34)

李德生上将:灵活机敏,聪慧细心

李德生将军灵活机敏,聪慧细心。参加红军时,部队嫌他年龄小,个子矮,不愿意要。将军到处请人说话。是时,某红军营长见之,指一通信员,对李德生曰:“你跟他赛跑,赢了,我就带你走。”将军与通信员赛,赢之。

红军营长又连出四题考李德生。问:“你跑的时候,路上听到什么?”李答:“有敲东西的声音。”又问:“敲几下?”李果断曰:“三下。”又问:“路上看到什么?”答:“有两个字。”又追问:“什么字?”答:“是红军吧!”该红军营长大喜,曰:“好样的!这个兵我要了。”

曾思玉中将:人小鬼大,机敏异常

某日,将军坐于一河石上,一士兵以新缴获之莫纳枪对准河石瞄准。将军曰:“老表,莫玩枪,莫玩枪,小心走火。”言毕离石而去。未料果然枪响,正中河中石。

长征途中打土城,将军带电话机随朱德总司令到前沿指挥所。敌一枪正中电话机,将军无恙。将军急劝朱德离开,朱德刚走,敌一发炮弹呼啸而至,离之咫尺,幸为哑弹。又某日,将军带突击连冲锋。敌土炮“呼”地飞至,将军一个腾跃,跳入田沟,土炮爆炸后数人被炸死炸伤,独将军无恙。

1931年冬,时任红军一〇八团二连政委的曾思玉将军奉邓华令,带官兵往沙村打土豪。途中与敌遭遇,退之。时将将军传令兵口渴,进一村庄寻水,将军随后。进村后竟遇十余国军,将军灵机一动,高声喊道:“一班、二班,随我来;三班、四班左右包抄。”敌军大惧,齐刷刷举手曰:“缴枪,缴枪!”将军忆此曰:“真是好险啊!”

曾思玉中将:“人也要追,表也要捡,两不误”

红军时期某战,时任班长的曾思玉将军

带两士兵追赶国军一军官。将军奔跑如飞,两士兵落后。敌军军官见曾将近,掏一怀表向后扔来,原想待曾拾表时以枪击之。不料将军个子小,飞跑之际,顺手将表拾起,继续追赶,终俘之。

将军回忆言:“那是在兴国的一个村庄。我才不那么傻,追人不要表,要表不要人。我是人也追,表也要。”言罢朗朗大笑。

红军时期某战,曾思玉将军所部被敌打散。将军一人突围出来,不辨方向。见有一独立房,敲门进,与老乡曰:“我是红军的侦察员,大部队在后面。”老乡信之,以地瓜招待。将军继叫老乡带路,并嘱老乡带一捆马尾松,每行岔路口,置一株,以作路标。老乡以为后面真有大部队,丝毫不敢怠慢也。天将亮,将军与老乡言:“老哥,你回去吧,我会走了。”老乡拔腿就跑。将军由此而走出敌军重围,回到红军部队。六团团长朱水秋见曾思玉回,曰:“这小子,鬼灵!”

吴岱少将:好记性,经历之事,数十年不忘

吴岱将军好记性,过耳报告,不用笔记,回来传达,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几与原报告原文相同。凡见面之人,经历之事,均能记之,人名、地名数十年不忘。将军儿时能唱数十首民歌,至老年仍一一未忘。如《穷人革命歌》《救穷歌》《哥哥去山东》等等。

吴岱将军善吹军号,号声嘹亮,能指挥部队前进、冲锋、撤退、向左包围、向右包围。将军亦能旗语:左手举红旗,右手举白旗。红白两旗上下翻滚,左右交叉,能示意对方:“注意左后方敌人”“派两个连左面迂回”“敌人溃退迅速追击”“向你们祝贺胜利”等。将军以旗语对答,准确、迅速。其时红军中能学会旗语者寥寥也。

吴岱将军参加红军后,好学不倦。冯文斌送将军四本油印小册子:一为《十大纲领和五大纲领》;二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三为《红军手册》;四为《红军识字课本》。将军通读一遍,即能背诵。某日,陈光见吴岱,当场出题考之,如十大纲领、红军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战十六字诀等,将军皆一一对答如流,陈光惊赏曰:“奇才!奇才!”

10.干起了做酒的营生

在悠远的历史年代里,上海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江临海的小地方,从未做过一省的省城,甚至连府治也不是,在很长时期里,它的状态完全游离于封建王朝的行政视野之外,甚至完全不在颀指气使的封建帝王的眼里。由于这个缘故,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上海发展变迁的直接记载很少。

谭其骧教授指出:上海最早的聚落兴起于一条名为“上海浦”的河流,因此是以上海浦得名,时间至迟在五代或宋初,即公元十世纪初。上海建镇的时间虽尚未发现确切的记载,但从《弘治上海志》卷五所载宋人董楷《古修堂记》及《受福亭记》可以肯定,是在南宋末的绍熙四年(1193年)至咸淳三年(1267年)之间。这种观点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

近年来随着考古活动的活跃,以及历史地理研究在资料获取、信息分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原来一些被认为很难利用的资料,在应用新的技术手段与研究理念的基础上,重新挖掘出其中的资料价值,可以获取丰富的历史、地理、社会等信息。例如北宋之前,生活在上海这个地方的先民,他们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什么?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聚落”应该是其主要形态。聚落(英文 settlement)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的场所。聚落作为人类适应、利用自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聚落的外部形态、组合类型无不深深打上了当地地理环境的烙印。

居住在“上海浦”西岸的先民聚落,他们以什么为生呢?当时上海先民主要的营生是煮盐、捕鱼和冶铁,这三种行当,件件都是力气活,在高温、潮湿或强体力劳动的条件下,生产劳作的工匠等对酒的需求日渐增大,进一步刺激了一些聚落对于酒的生产积极性。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吴淞江及其支流上海浦西岸的许多聚落都干起了做酒的营生,酒坊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北宋年间有着这样的社会背景,即宋代前承汉唐之制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又开启明清乃至近代社会历史变化的端倪,显现出中

国封建社会历史转折的新特点。宋代的酿酒业,在唐朝普及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处于中国酿酒史上的提高期和成熟期,大量酿酒理论著述问世,蒸馏白酒的出现,酗酒商贾继承和发展唐代经营思路,标志着酒文化的成熟和发展。一方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汴京和临安等大都市空前繁荣起来,人们对酒的消费需求量大增。另一方面,粮食的丰足,酿酒业技术的成熟,使酒类品种增多,酒的质量提高,酒业的生产范围扩大。宋代的酿酒业,上至宫廷,下至村寨,酿酒作坊星罗棋布,分布之广,数量之众,都是空前的。

北宋初年朝廷实行禁酒的政策,不许私人酿酒。后来,随着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对酒的专营与垄断逐步松动。但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酒税都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为了收到足够的酒税,有宋一代对酒的生产 and 销售管理还是很严格的。除了京城外,其他城市实行官府统一酿酒,统一发卖的榷酒政策。酒按质量等级论价,酒的质量又有测定标准。每一个地方,都有代表性名酒。北宋和南宋官府,为了促进酒的销售,都曾经组织所属酒库,举行过声势浩大、热闹非凡的评酒和宣传促销活动,这种活动就像近几年召开的酒博会一样壮观。

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来鸟瞰东晋以来的上海民生状态,就不能忽视酒业在上海浦周边的存在。两晋时代上海出现过两位在文化上负有盛名的大文士陆机和陆云兄弟,史称“云间二陆”,乃祖陆逊、乃父陆抗均为三国名将,这对才华横溢的兄弟是出名的文学家,也是出名的酒仙,被时人誉为“美玉”,由此形成流传千古的“玉出昆冈”之说。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允许民间自由酿酒,酒业市场十分兴盛。加上许多身处乱世的人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短暂,酒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甚至是应付世事的方式。日久天长,饮酒的情趣逐渐积淀下来,便使酒有了淳朴、闲适、平和、自然的生活象征意义,使酒成为一种超脱豁达的人生态度的折射与反光,在闲适平和的背后,深深地沉淀着对现实的不满,对真与善的崇尚,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醉上海

仲富兰

